

乡村振兴专题研究(二)

引文格式: 盛雨潇. 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视域下优化农村公共空间治理的现实路径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4(2): 14-21.

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视域下 优化农村公共空间治理的现实路径

盛雨潇

摘要: 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构成部分,以优化空间治理为目的,以最终实现空间正义为归宿,既能在现实性上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又能在价值性上推动空间公平正义。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空间正面临治理的诸多困境,政府有关部门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找到破解困境的有效之举,从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事业的稳步实现。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社会空间理论; 农村公共空间; 现代化治理

作者简介: 盛雨潇,中共南通市海门区委党校讲师,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江苏省党校系统调研课题“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视域下优化农村公共空间治理的现实路径——以N市H区为例”(XT21077)。

中图分类号: A811; D669.3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3.02.002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以亨利·列斐伏尔、大卫·哈维、曼纽尔·卡斯特为主要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的研究。他们在吸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的新特征对空间理论进行了更广维度的探索,力求构建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而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自然空间逐渐隐退,社会空间日益凸显,“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而是社会的表现。换言之,空间不是社会的拷贝,空间就是社会”^{[1]4}。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逐渐成了学术界研究的焦点,这种理论从单纯的哲学向度研究到与资本全球扩张、城乡分离结合,再到置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而得到检验与丰富。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逐渐呈现出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新的理论思维。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的本质溯源与内涵发展

社会空间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对社会空间的研究也自然与人的思维、实践、本体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本身具有的实践本质和人本本质成为这一理论不断发展创新的生长点。

纵观近代哲学,都离不开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哲学本

质的探讨也必然围绕着思维与存在问题展开。其实早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中，马克思就已经初步涉及对“感性的空间”的考察，旨在对黑格尔的“抽象空间观”进行批判反思，“首先，如果把虚空想象为空间的虚空，那么，原子就是抽象空间的直接否定，因而也就是一个空间的点”^[2]，这种观点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的萌芽。因为此时马克思还并未在思想上转变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所以形成的空间观点带有较为明显的唯心主义痕迹，并未跳出自然哲学的范畴。如果说，黑格尔的空间思想是抽象而缥缈的，难以突破自然哲学的束缚，那么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则打破了自然哲学的界限，将空间理论引入社会领域。“空间本体论”的唯心主义思想也随着物质空间第一性的原则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哲学基础——实践唯物主义的本体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就是：“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由此，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缺乏实践的观点而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的泥淖。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实践的观点，依托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考察，遵循资本的运作逻辑，阐述资本的全球扩张对世界格局产生的重大影响。“空间资本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要求和前提条件”^[4]，在资本主义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中，区域间的隔阂被打破，空间交往的频繁和紧密程度较手工业时期有了极大的提升，马克思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道：“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5]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货币、商品、资本的空间流通对消除地域的封闭性和局限性具有积极作用，同样也使人类的历史进程由割裂走向统一。

人类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探寻的终极问题。而资本的全球扩张造成的社会空间的压缩不仅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历史对立的形成^{[1]71}，还使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权利遭到严重侵损。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的价值归宿便是致力探索实现“社会空间正义”的有效路径，扭转社会空间异化的局面，从而凸显人本本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看到了在过剩资本的推动和资本主义危机的驱使下，资本的全球空间扩张对人生存空间的无限剥夺。马克思认为应该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这一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在此基础上争取生产与发展的空间正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围绕资本的运转逻辑，发现了处在特定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理想环境下，社会空间演变的特殊规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其生成和布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空间改造和重组的动态过程”^{[1]72}，从而极大地超越了资产阶级学者已有的关于社会空间形而上的相关理论，也为进一步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空间维度。

在马克思对社会空间理论的研究成果之上，以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等为代表的诸多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结合自身学科背景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多维度的个性化探索，在弱化对理论本身研究的同时，加强对理论应用性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内涵得以延伸到多种学科。首先，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力理论”作为现实批判的重要媒介，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重点研究空间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异化劳动力理论”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核心思想，围绕劳动、劳动产品、人的类本质、人的异化，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劳资关系是造成阶级对立的根源所在，“最后，资本家和靠地租生活的人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6]。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将社会空间理论应用到了地理学领域，试

图揭示出资本主义出现的各种矛盾对立与空间生产异化之间的联系。他延续了马克思空间理论的研究思路,从资本主义城市中存在的异化表象出发,把空间明确地划分为物理的自然空间、主观的精神心理空间和实践的社会空间^{[1]145},并将社会交往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空间存在”。在其另一本代表作《日常生活批判》中,列斐伏尔从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立场出发,虽未直接涉及对社会空间理论的阐述,但是间接指出必须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来扭转日常生活空间的异化进程,实现“改造道德秩序的革命设想”与“恢复美学本性的革命设想”^[7]。其次,哈维较为系统地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引入对社会空间的研究,着重对“资本空间”的产生路径、结构变迁、危机出路进行考察,力图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1]148}。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重点如出一辙的是,哈维也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的基础上首创性地提出了缓解社会危机的“资本积累的次级循环理论”。他致力于研究的城市空间动力学也为众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了解城市日益纷繁复杂的矛盾动因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哈维提出了“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这一重要的概念,用来表述在后现代的时空视域下,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引起的全球空间的缩减。“地球村”的产生一方面使世界各地的联系更为紧密,另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扩张也会导致经济危机向全球蔓延。最后,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正义”提出了符合时代发展特征的理论路径。这种理论架构在互联网信息时代,旨在表明社会的管理精英依托网络平台,掌控“流动空间”的动态趋势,着力发展符合自身利益的“文化代码”,而民众则必须被动接受这种意识形态的输入。针对这种现象,卡斯特同时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兴许会带来“流动空间”的扭转,通过生产元素的重组与整合,原有集权控制的权威世界将会被推翻,新秩序将会被重新建立^[8]。这样的观点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是在原有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信息技术的新发展形成的创新观点,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的中国式探索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的研究始于毛泽东时代。革命早期,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可以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通过总结以往斗争经验,毛泽东看到中国军阀割据、支离破碎的惨淡现状与农村革命力量的蓬勃生命力。红色政权在军阀割据的狭小险境中夹缝生存却以燎原之势生生不息,“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9]。这种前所未有的独特空间布局让毛泽东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则看到了灵活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对扰乱敌军的作战空间部署具有的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方面,他在1956年所写的《论十大关系》中首先对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轻重缓急进行了梳理——既要重视重工业的发展,也不能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要促使区域间产业的齐头并进。同时,他认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10],这种观点表明要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形成以强带弱的良性发展链条。之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的中国化进程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两个大局”“一国两制”“科学

发展观”等开创性政策的提出，在统筹区域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协调市场机制、规范生产要素等方面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延续前人的步伐，积极探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的现实路径，旨在构建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空间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以“民生空间”为根本，以“生态空间”为重点，以“网络空间”为载体，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治理。

着力构建“民生空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现实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空间”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补牢民生短板，决胜脱贫攻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的就是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贯通，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空间的协调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奠定基础。脱贫攻坚蕴含的空间向度体现在区域的协同发展，或者称之为“空间维度的公平”——“在区域上，脱贫资源不是平均划拨，而是根据地区贫困程度、经济条件、社会环境等综合确定。贫困地区的脱贫不以损害其他地区的经济资源为代价”^[1]。第二个方面表现在坚持底线思维，健全民生保障的体制机制。社会保障体系是构筑“民生空间”的关键屏障，近年来，党中央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收入等多个民生领域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抓重点、解难题、勇创新，不断激发民生保障体制机制活力，持续推进各项民生实事稳中求进。但是，“民生空间”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广泛、综合的范畴，仅仅依靠政府力量与制度扶持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民生空间”的构建目前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例如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导致民生事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人口的持续负增长不仅引发社会赡养压力空前增长而造成财政压力不断增大，同时，中度的老龄化趋势也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的劳动力结构和消费结构，使国民经济发展缺乏新鲜活力。此外，一些无法预估的风险因素也深刻影响“民生空间”的构建。例如，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民生空间”的安全维度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把牢人民安全底线，提升整个社会风险处置能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构建“生态空间”是建成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旨在社会范围内形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目标。目前，构建“生态空间”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之下逐步系统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着力营造绿水青山的绿色空间，为全球的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同样蕴含着空间向度，是在全球空间的视域下对“气候正义”的诉求。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并未被赋予强制减排的国际义务，但是却一直致力于构建全球气候的新格局，不断完善本国碳排放的顶层立法设计，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低碳意识，成为全球生态环境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主动彰显大国担当，展现大国作为。

与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理论的实践背景相类似的就是习近平的“网络空间”新理念，这种理念同样架构在当前互联网信息飞速发展、数字经济快速崛起的新时代。“网络空间”不仅是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载体。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了“网络空间”的概念，并指出依靠互联网平台可以让现实世界更加丰富多彩。“网络空间”无疑是多样、多变、多彩的，它的复杂性和交互性决定了这一空间有无限的潜力。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互联网技术的问世、运用和发展正在不断加速原有社会交往结构的解体与重组，取而代之的是依赖于“网络空间”进行的种类繁复的交往活动。在这一背景之下，规范“网络空间”的运行程序，促进我国“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的建立

就显得尤为重要。“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的建立,一方面依赖于建立者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握。目前,互联网已然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中国共产党能否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关乎国家安全和民族振兴,关系到人心向背。在纷繁复杂的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更应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积极引导人民群众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甄别网络信息,去伪存真。另一方面,组建多元协同的“网络空间”主体队伍,规范“网络空间”的法治化建设,也是建立空间新秩序的关键环节。“网络空间”本身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能够吸纳不同类别的群体,满足不同种类的需要。但是,“网络空间”的参与者鱼龙混杂,善恶难辨,因此应加快推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的多元协同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12]的建立,形成带头队伍的正向效应。同时,继续完善“网络空间”治理相关法律法规,着力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对优化农村公共空间治理的启示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视域下,最终实现空间正义是进行空间治理的归宿。其中,衡量空间正义的重要维度之一就是实现农村空间的有效治理,而农村的公共空间作为农村空间治理的关键靶点,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一直是诸多学者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涵盖的观点、逻辑和方法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为优化农村公共空间治理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空间治理正面临权力强度缩减、人口质量降低、服务功能萎缩、乡土文化缺失、治理转型困难的问题。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以及对我国农村公共空间治理现状的研究,笔者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强化农村公共空间权力,促进党建引领与公共权力相统一。农村的公共权力是维系社会秩序和村民交往的重要纽带,强化公共权力的强度能够有效提升村民对村庄权威的认同感。推动党建引领和农村公共权力的有机统一是强化公共权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步骤。党建引领村委会建设。通过积极拓展组织网格的方式将行政权力输送到空间治理的细枝末节,并动员区域内的党员群体形成身份认同,借助以价值和情感为导向的党性教育工作,形成以党员下沉和党建嵌入为主的治理模式。党建引领话语权构建。依托多样的社会化党建平台,织牢织密农村的党建网格,并推动党建网格和治理网格在组织和人员上的“双重融合”,从而吸纳更多多元主体参与到农村公共空间治理中去,塑造多元共治的理想格局。同时,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为治理主体提供表达意愿和共享服务的平台,提升数据治理和智慧治理水平,实现“一网通办”。党建引领合作社发展。一是要在组织引领下加强“村企合作”,提升经济效益。依靠相关企业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注入,探索新型盈利模式,致力于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聚力打造“拳头产品”。二是要在组织指导下调节固有矛盾,塑造和谐关系。合作社应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再整合和再分配力度,对土地、产权、劳动力等具有纠纷可能的因素进行细致排摸,力求做到管理全面、利益均衡。三是要在组织统领下落实相关政策,创造良好环境。落实村级留用地政策,并探索建立集体用地流转机制,完善村级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走上权责明确、运转高效的现代化经营管理之路。

第二,优化农村公共空间人口,促进人口质量与地域需求相统一。乡村振兴需要多层次和专业性的人才队伍。针对农村公共空间面临的空心化、异质化、老龄化现象,如何提升农村公共空间人口的总体质量,减少本地人才的流失程度,吸引优质的外来人口安居乐业,满足老龄人口的

保障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留得住”本地人才资源。加大对农村本地实用人才尤其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力度，围绕乡村振兴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提高村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激发本土人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优势。充分发挥本土“新乡贤”的示范带动作用，以乡愁为纽带，既要以情留人，更要以业聚人，为“新乡贤”群体提供干事创业的平台和政策扶持。“引得进”外来人才资源。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人才吸引机制，通过实施政策性奖励吸引一批城乡外来人才下沉到农村基层一线，扩充农村人才队伍的规模和力量，带动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向农村流动。同时，通过选拔选派的方式，安排一批文化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青年干部去农村挂职锻炼，打破农村和城镇间干部的流通壁垒。“保障好”老龄人口资源。“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意味着从国家战略层面，不仅应在老龄人口保障方面做出新的成效，也应积极挖掘老龄人口的优势资源，转变应对老龄化的思路方式。面对农村公共空间的老龄化问题，一方面，相关部门要提供完善的养老保障公共服务，包括扩大老年医疗服务覆盖范围、提高老年低保群体政策补助、丰富老龄人口精神活动等。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掘老龄人口的社会价值，针对一些尚有能力履行社会责任的老年人可以实行弹性退休或退休返聘制度。也可组织部分老年人开展志愿活动，例如开展本土文化的宣传工作和对古迹的维护工作等，让老龄人口在被需求中发挥余热，将社会负担转变为社会资源。

第三，细化农村公共空间服务，促进服务功能与人民期望相统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农村公共空间治理的价值基础。农村公共空间要以提升公共服务的多样性和全面性以满足农民的社会需求为基本导向。一是打造“生活型公共空间”。积极建构“生活型公共空间”是公共服务落地落实的有效举措之一，遵循短途、便捷、安全的原则为村民提供平等化的公共服务，实现公共资源的公平有效配置，依托“教育圈”“医疗圈”“养老圈”等惠民公共空间，大力提升公共服务的精细度和精准度。二是打造“虚拟型公共空间”。面对日益复杂的治理问题，传统治理模式已无法满足公共服务需求，而将“虚拟型公共空间”嵌入农村公共治理体系有利于弥补实体型公共空间的缺陷。乡村治理主体部门应积极搭建以微信（群）为主要载体的沟通平台，拓宽村民交流渠道，延伸公共服务的跨度范围，实现村民跨区域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应看到“虚拟型公共空间”的形成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因此在治理中要不断优化对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的应用与监管，依托现代科学技术，达到公共空间服务精准到户，精确到人。三是打造“生态型公共空间”。“生态型公共空间”必定是凸显“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并致力于提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的公共空间。建设“生态型公共空间”需要从优化生态空间规划着手，充分平衡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部门利益和集体利益，对生态空间挤占缩减等问题给予充分的政策关注和法律回应。同时，充分满足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诉求，围绕保障生态安全的目标，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真正做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

第四，美化农村公共空间文化，促进乡土文化与品牌打造相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文化振兴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而乡土记忆与传统文化的缺失成了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障碍，因此，要激活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和外在活力，需要不断唤醒农民的乡土记忆，不断提升农民的文化自信，不断发展农村的特色文化产业事业。唤醒农民乡土记忆，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势必会对乡村传统文化产生冲击，乡村传统文化也势必会随着时代变迁发生变化。但是变化并不意味着消散，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也并不是单纯的对立关系，而应在不断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中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农村的公共空间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的重要场所，要以公共空间为文化载体，

利用好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吸引更多农民开展民风民俗传承发展系列活动，营造浓厚的乡村文化氛围，感受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夯实新时代乡村文化的认同感。提升农民文化自信，消解农民精神贫困问题。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大量的外来文化植入农村生活，面对日益复杂的文化环境，如何提升农民的文化自信、消解农民精神贫困问题成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中之重。应充分发挥农村公共空间的文化教育和传播作用，依托优秀文化思想凝聚村民的价值共识。既要运用好与传统美德和革命精神相关的本土文化资源，也要充分融入新时代民生、法治、生态等先进思想，推动提升文化自信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有效衔接，实现传统美德与现代新风相结合的教化育人方式。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事业，解决文化品牌效应竞争力不足问题。农村特色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将文化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的重要环节，旨在实现文化的社会效益。地方政府应科学、准确、综合地运用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相关手段，依托当地现有的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积极打造区域特色文化品牌，并不断提高品牌的含金量和知名度，带动文旅产业的协同发展。同时，也要加强对农村特色文化事业的管理，给予区镇和农村对特色文化项目进行规划和治理的权限，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产业。

第五，深化农村公共空间转型，促进基层治理与城乡融合相统一。新时代，加大农村公共空间治理的转型力度，加快城乡融合的前进步伐，以自治、法治、德治的善治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以基层自治为支撑点。农村自治强调农民主体的社会参与度，通过吸纳农村固有的治理资源重塑乡村共同体，激发农民群体参与农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依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相关流程，形成“政府-农民”直接联系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体管理、民主监督的基层自治模式。同时，基层自治也需要制度供给，应加大农民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的培养力度，建立农民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增强自治的效能感。以基层法治为发力点。大力构建基层治理的法治体系，通过完善各项法律制度维护农村的集体利益和农民的个人利益，对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民生保障等现实问题应给予充分的法律回应。同时，积极重塑法治文化，提升基层治理的法治含量，可通过加强基层的法治队伍建设和推进法治思想教育的普及化、常规化和规范化，推动法治文化的入脑入心，帮助农民树立法治信仰。以基层德治为创新点。基层自治和法治的实现需要借助德治的力量，公民和国家的意志需要借助农村社会已形成价值共识的传统美德和公序良俗才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基层治理格局。因此，要创新运用德治润物无声的方式方法，强化农村社会家风家训的教育功能，以身边模范为榜样，引领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以优秀乡贤为带动，营造反哺家乡的优良风气，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力量，打造崇德向善的治理风格。

参考文献：

- [1] 张荣军. 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 [4] 孙江. “空间生产”：从马克思到当代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1.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16: 89.
- [7] 黎庶乐, 郑智元. 人类解放何以转向日常生活批判: 列斐伏尔“改造道德秩序的革命设想”对马克思思想的诠释 [J]. 学术研究, 2021 (12): 41-46.
- [8] 罗敏. 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及其在城乡关系上的应用研究 [D].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2012.
- [9]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48.
-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6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85.
- [11] 何植民, 蓝玉娇. 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 一个概念性分析框架 [J]. 行政论坛, 2021, 28 (1): 28-38.
- [12] 肖唤元, 郑晶晶.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四重“论”域透视: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0 (1): 9-16.

A Realistic Path to Optimize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Public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Socio-Spatial Theory

Sheng Yuxiao

Abstract: Marxist socio-spatial theory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hich aims to optimize spatial governance and ultimately realize spatial justice. It not only enhances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but also promotes spatial justice in value. Currently,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public space in China is far from satisfactory.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make use of Marxist socio-spatial theory to seek effective ways to solve this dilemma and promote the steady realization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Marxism; socio-spatial theory; rural public space; modern governance

(收稿日期: 2022-08-20; 责任编辑: 晏小敏)